

从现代化发展的视角来思考双语教育

马 戎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871)

摘 要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拥有自己语言文字的各少数民族如何参与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中,并使本民族在各领域得到充分发展,对于实现民族平等和巩固国家统一都非常重要。本文首先从社会学“民族分层”的角度,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普查数据为案例讨论了中国的“民族分层”现状,提出只有当各少数民族的职业结构与汉族的职业结构大致相似时,才能在相同程度上参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事业,并具有相似的社会影响力和话语权。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后,少数民族劳动者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对就业者的语言和业务能力的要求,而汉语能力和使用汉语掌握专业知识的能力已经成为他们就业和发展的瓶颈。本文还以自治地区 3 所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为例,说明汉语文出版物提供的知识信息是少数民族不应忽视的重要知识来源,也是各少数民族进入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重要渠道,应该从少数民族实现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今天各少数民族自治区推行的双语教育工作。最后作者讨论了当前在我国推动双语教育过程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 少数民族的现代化;民族分层;双语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68(2012)03-0136-21

在 21 世纪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开展学校教育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通过对青少年的母语和传统文化的系统教学活动,把本国社会历史上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和主流价值观传授给下一代,使其得以传承和发展;二是通过工具语言和现代知识体系的系统教学活动,使本国青少年得以掌握这些知识与能力并顺利实现就业,成功地投身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激烈竞争。21 世纪是科技、经济、贸易和文化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各国之间在科技创新、经济发展、金融贸易、资源开发、文化交流和外交攻防等领域开展激烈竞争的时代。这种竞争态势不仅出现在各国之间,也必然以各种方式出现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各族群之间。为了保障本国经济的顺利发展,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增强和巩

收稿日期:2011-12-06

作者简介:马戎,男,回族,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固国内各族群的和谐共处与国家凝聚力,各国中央政府必然会根据本国各族群不同的发展基础和相互竞争态势,利用国家资源和政府政策来进行调节,扶助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体,努力使各群体逐步实现均衡和同步的发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

社会学家从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这两个角度来分析语言的自身性质和应用功能,通常认为语言具有双重性:第一,语言是各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第二,语言是信息交流和学习知识的工具。^[1]如果我们对当前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各族群竞争能力的不平衡问题给予更多关注,还可以把语言的工具性功能进一步分解为“日常生活交流工具”和“现代化知识学习工具”这两大类,特别是第二类语言工具的掌握和运用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民族群体和每个个体成员参与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的能力和取得成功的发展空间。

一、通过“族群分层”来分析各群体的竞争能力和发展态势

(一)“族群分层”是社会学研究各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相对位置的主要方法

对于如何衡量一个国家内部各族群在现代化事业中的竞争态势,以及如何分析造成竞争能力不平衡的影响因素,美国社会学家采用“族群分层”的比较方法对美国各族群之间的竞争能力和竞争态势进行分析。西方社会学在进行“族群分层”研究时常用的指标有八个:人口城乡比例、劳动力产业分布构成、劳动力职业结构、人口受教育结构、劳动者或家庭收入、家庭消费结构、劳动力失业率、人们的自我社会阶层认定。^{①[2]}其中职业的获得往往与受教育水平相关联,并决定了收入、消费和社会地位,因此职业结构被认为是一个核心的分析指标。

一个比较理想的国家内部“族群分层”状态,应当是各族群的职业结构基本相同(如图1),即社会管理人员(政府官员、议员、法官等)、科技与专业人员(科学家、工程师、金融家、企业家、医生、教师等)、普通办公室职员(政府、企业办事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售货员、店员等)、技术工人、普通非技术工人、农民这几个职业在各族群劳动力内部所占的比例大致相似。假设一个国家在业劳动力的职业结构中管理人员占2%、科技专业人员占6%、办公室人员占12%、服务业人员占10%、技术工人占10%、非技术工人占25%、农民占35%,那么不论各族群人口和劳动力实际规模如何,各族群(图1中的A、B、C、D)内部的劳动力职业分布应当大致与整体结构相近。这体现出各族群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大致相近,在社会各阶层中都有自己的代表,在社会决策过程中具有大致平等

^① 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研究者可以在问卷中设计若干主观判定指标,如“自认为属于哪一个社会阶层(上层、中层或下层)”。对主观判定问题的回答,有时也可作为客观数据资料的辅助材料,帮助我们理解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与心理状况。

的影响力。当然,由于历史造成的行业职业分布传统、各族在就业中的传统价值取向、主流社会部分成员可能存在的群体偏见和歧视等各种原因,这样绝对理想类型的族群职业结构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职业倾斜;但是,这并不妨碍本文以这个“理想型”的族群职业结构作为参照系,分析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分层”态势,比较各族群在就业竞争中的相对优势和相对劣势。同时,根据不同时期职业分布结构的统计调查数据,研究者还可以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族群分层”的演变趋势进行分析,看看各族群之间的差距是在缩小还是在扩大,各自的“社会流动”能力与“成绩”如何,并以此为依据来讨论改进族群关系相关政策和措施的实践实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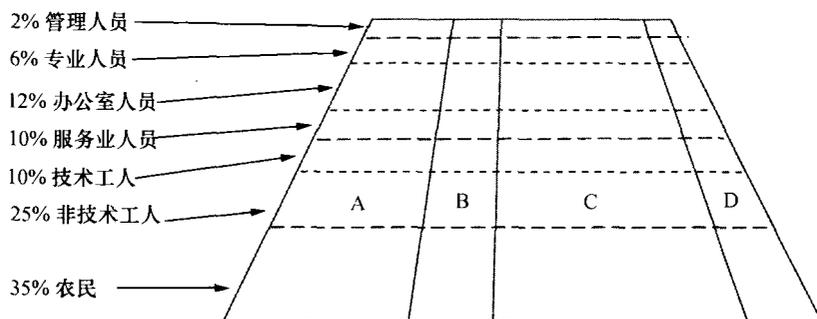


图1 国内各族群结构比例模型

(二) 美国社会“族群分层”的特点

以劳动力的职业结构为例,表1介绍了1990年美国五个主要族群的劳动者职业构成。这些比例数字生动地展示了美国劳动力市场上各族群在就业竞争中的基本态势。在亚裔(包括日裔、华裔、韩裔、印度裔等)全部在业人员中,担任“管理和专业人员”职业(社会地位和收入较高)的比例甚至高过白人,西班牙语裔担任这一职业的比例低于黑人;三分之一的黑人男性劳动者集中在

表1 美国各族群就业人员的职业构成(1990年)(%)

职业分类	白人		黑人		西班牙语裔		亚裔		印第安人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管理与专业人员	27.3	27.3	13.4	18.8	10.7	16.0	35.9	27.9	13.5	20.9
技术、销售、行政支持	20.8	45.7	16.6	39.7	14.7	38.4	24.3	43.3	13.9	39.1
服务业	8.7	16.1	17.5	27.0	16.2	25.1	14.6	15.7	10.0	23.8
高级技工、修理、工艺	19.9	2.1	16.3	2.3	20.6	2.7	12.4	3.0	22.1	3.2
操作、装配工	19.2	7.6	33.3	12.0	29.8	16.7	11.6	10.0	35.1	11.8
农、林、渔业劳动力	4.1	1.1	2.8	0.2	8.9	1.1	1.2	0.1	5.4	1.2
总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 Aguirre, Adalberto Jr. & Jonathan H. Turner. (1995). *American ethnicity: The dynamics and consequences of discrimin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7.

“操作、装配工”这一职业,各族女性劳动者普遍集中在销售、办公室办事员这两个职业。这些构成比例显示出各族群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态势和社会地位的相对位置。美国的社会学家和政府决策者正是基于这种族群结构特征的比较分析来检验以往政策的实践效度,探讨今后的政策需要哪些必要的调整。

在现实中的美国社会,各族群之间在参与社会发展方面的竞争力和话语权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例如犹太人仅占美国人口的2%,但是成年犹太人中大学毕业的比例达到53%,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1%)^[3];犹太人当中涌现了多名州长、参议员和众议员,甚至在2000年被选为民主党美国副总统候选人。由于犹太人基本控制了美国的主要媒体,可以影响全国和地方选举,所以在国内政治和外交上具有很强的话语权,也决定了美国历届政府必然会对以色列给予无保留的支持。与之相比,印第安人除了少数青年外出求学就业外,其人口主要聚居在政府设定的实施高度自治的“保留地”里,与美国这个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基本隔绝,大学毕业率仅为9.4%,失业率高达50%。^[4]在美国政界、科技界、教育界、司法界甚至在黑人群星灿烂的体育和娱乐业中都难以见到印第安人的影子,更谈不到在政府重大决策方面的社会话语权。美国联邦政府给予土著印第安人以高度自治权,但是政府实施的种种优惠政策(如特许开设赌场等)似乎并没有把印第安人带入现代化进程,而且不断被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也使各印第安部落的传统文化处于凋零而缺乏生机的状态。所以,美国政府和主流社会在讨论今后改善“族群分层”的政策调整时,除了继续改善西班牙语裔、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族群差距外,土著印第安人如何发展将是一个重要议题。

(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民族劳动力的职业结构

新疆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本文通过新疆这个案例来分析一下中国当前“族群分层”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本文先把新疆各族劳动力职业结构之间的比较做一归纳(参见表2)。

1. 维吾尔族从事农业劳动的比例尽管在1990~2000年期间略有下降,在2000年仍有80.5%,在各族中比例仅低于柯尔克孜族(84.32%);汉族从事农业劳动的比例最低(36.8%),而且明显低于全国汉族的平均比例(63.1%)。从收入水平比较,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农民仍以家庭承包的形式从事传统粗放型种植业,平均收入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和非农职业劳动者。2010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5,919元,仅为城镇居民平均收入21,033元的28.1%;同年新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643元,是新疆城镇居民平均收入15,422元的30.1%。^[5]所以80%以上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劳动力集中在农业,表明这两个群体的整体平均收入低于新疆其他群体。

2. 维吾尔族担任政府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比例在各族中比例最低(0.83%),相比之下汉族的领导干部比例最高(3.99%),显著高于全国汉族的平均比例(1.72%);蒙古族和回族担任“领导干部”的比例(分别为2.86%和

表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族群就业人员的职业结构(%)

职业分类	政府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商业工作人员	服务性工作人员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生产设备操作人员	其他	合计
1990年									
新疆合计	2.46	7.95	2.59	2.95	3.08	64.35	16.54	0.08	100.0
汉族	4.48	12.40	4.54	4.22	4.92	38.06	31.23	0.15	100.0
维吾尔族	0.87	4.14	1.07	1.98	1.64	84.14	6.14	0.02	100.0
哈萨克族	1.81	8.77	1.79	1.31	1.58	80.35	4.36	0.04	100.0
蒙古族	2.93	13.96	3.20	1.64	2.24	67.74	8.09	0.20	100.0
柯尔克孜族	1.58	6.71	1.67	0.69	1.22	85.40	2.73	0.01	100.0
回族	1.85	5.32	2.04	4.47	4.20	66.92	15.13	0.08	100.0
2000年									
全国合计	1.67	5.70	3.10	9.18		64.46	15.83	0.07	100.0
全国汉族	1.72	5.80	3.19	9.52		63.09	16.61	0.07	100.0
新疆合计	2.29	8.16	3.86	10.57		61.10	13.91	0.11	100.0
汉族	3.99	11.12	6.10	17.20		36.77	24.73	0.08	100.0
维吾尔族	0.83	5.35	1.93	5.41		80.51	5.84	0.13	100.0
哈萨克族	1.86	9.64	3.13	3.34		77.22	4.76	0.04	100.0
蒙古族	2.86	14.80	6.16	6.07		61.45	8.48	0.16	100.0
柯尔克孜族	1.47	8.01	1.70	2.63		84.32	1.86	0.00	100.0
回族	2.08	5.48	3.56	15.37		60.65	12.72	0.14	100.0

资料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第532—535页;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编:《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上)》,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821—824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572—577页。

2.08%)也高于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同时,由于1990~2000年间其他非农业就业岗位的迅速发展,各族领导干部在劳动者总数中的比例均有所下降。政府等单位负责人在社会和本单位普遍具有决策地位和话语权,可以被归类为社会“政治精英”,是运用社会权力和影响政府政策的主要群体,因此,维吾尔族领导干部比例偏低是政府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一个社会结构问题。

3. 维吾尔族和回族的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在各族中最低(5.35%和5.48%)。2000年,蒙古族的技术人员比例最高(14.8%),其次是汉族(11.12%)、哈萨克族(9.64%)和柯尔克孜族(8%)。专业技术人员(学者、医生、教师、工程师、记者等)通常具有较高教育程度,有专业技术职称,可以归类为“知识精英”,在社会和政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仅次于“领导干部”,这是普通工人和农民无法相比的。即使他们的收入不如个别商人和企业家,但是专业技术人员整体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和福利通常令其他职业的从业者羡慕。

4. 2000年,汉族劳动力中有24.7%为工业、运输业的产业工人,回族的比例也高达12.72%,相比之下维吾尔族的比例只有5.8%,柯尔克孜族从事工业

运输业的比例最低(1.86%)。第二产业的工作岗位相对稳定,一般都有退休、医疗、保险等重要的社会福利,正是这些工人支撑起一个国家的现代实业经济,生产出各类产品,向国家提供税收,在现代社会和经济结构中是一个重要的有组织的职业群体。

5. 办公室人员一般指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中除了负责人之外从事非体力劳动的职员,要求有一定的受教育水平,享有退休、医疗、保险等重要的社会福利,其社会地位和收入一般也高于普通工人和农民。汉族和蒙古族的办公室人员比例(4.54%和3.2%)高于其他民族,并在1990~2000年间明显提高(6.1%和6.16%),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这两个群体在非农行业中的社会网络和影响力。1990年维吾尔族从事这一职业的仅占1.07%,2000年增加为1.93%,在此期间几乎增长一倍,稍微超过柯尔克孜族,但比例仍不到汉族的三分之一。

6. 汉族劳动者有17.2%是商业服务业人员,而维吾尔族在第三产业的劳动者中只占5.4%。商业服务业是现代商品流通的主渠道,支撑起大众的日常生活消费和社会的生产性消费,在西方工业化国家是就业人员的主体^①,在国家社会和经济结构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虽然回族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办公室人员这三个职业的比例低于汉族,但是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比例(12.72%和15.37%)都显著高于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回族以汉语为母语,比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更容易进入第三产业就业。商业服务业人员虽然主要为私营经济,社会地位和政策话语权不强,但是收入一般高于农民。其中部分私营企业家的资产、收入和消费水准可能很高,在经营中形成某种社会网络,成为他们进一步发展的“社会资本”。

通过以上各族劳动者职业结构的相互比较,可以大致看出新疆各民族在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科技文化和专业领域、生产部门、商业服务业、农民中所占的比重,从中折射出各自在相对社会地位和话语权方面的差距。在整体上,汉族和蒙古族居于一定优势地位,回族在工业和商业服务业中有一定优势,维吾尔族在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办公室人员中的比例都几乎为最低,农民比例显著高于除柯尔克孜族之外的其他群体。因此,如何改变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职业结构以逐步增加其话语权和整体收入水平,将是新疆“族群分层”研究和政策调整的主要议题。

(四) 职业结构与各族劳动者受教育结构之间的关系

假如认定中国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招收条件中都要求有大学(或专科)毕业文凭,那么各族劳动力的受教育情况将直接影响他们在这两个职业中的竞争。目前许多单位在招收办公室职员(办事人员)时要求应聘者具备大学毕业资格,至少中专和高中毕业资格。所

^① 1991年美国就业人员中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比例达到71.3%。

以,各族人口受教育结构的比较有助于分析目前职业结构的形成原因与机制。

表3为2000年新疆各民族6岁及以上人口的受教育情况^①。从受教育水平的高端来看,新疆汉族人口的大学本科和专科毕业生比例(2.06%和7.14%)不仅高于新疆其他群体,而且明显高于全国汉族的平均水平(1.26%和2.57%),这与新疆汉族劳动者中农民比例小于全国汉族平均比例和干部、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较高有关。蒙古族的大学本科和专科毕业生比例(2.02%和6.28%)只略低于汉族,汉族和蒙古族在高中和中专这两组的比例也在各族中最高,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汉族和蒙古族在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办公室人员三个职业中的高比例。

表3 200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民族6岁及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结构(%)

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	扫盲班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学专科	本科	研究生	合计
全国合计	7.75	1.80	38.18	36.52	8.57	3.39	2.51	1.22	0.08	100.0
全国汉族	7.26	1.72	37.56	37.31	8.82	3.41	2.57	1.26	0.08	100.0
新疆合计	7.31	1.80	41.63	30.26	8.42	4.95	4.17	1.42	0.04	100.0
汉族	5.87	0.89	27.79	36.62	13.20	6.37	7.14	2.06	0.07	100.0
维吾尔族	8.83	2.84	53.19	24.57	4.31	3.57	1.73	0.95	0.01	100.0
哈萨克族	3.16	0.74	48.53	30.43	7.48	5.62	2.89	1.12	0.01	100.0
蒙古族	3.94	0.96	36.56	30.10	11.35	8.75	6.28	2.02	0.04	100.0
柯尔克孜族	8.10	2.39	57.15	19.43	4.64	5.19	2.34	0.75	0.01	100.0
回族	11.60	1.45	42.60	31.02	6.44	3.71	2.57	0.32	0.02	100.0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编:《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上)》,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563—567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320页。

新疆回族劳动者中的大学毕业生仅占0.32%,大约是母语相同的汉族比例的七分之一,是维吾尔族比例的三分之一,甚至不到全国回族平均比例(1.34%)的四分之一。回族与新疆其他少数民族上大学比例的差距,有可能与大学录取中优惠政策的不同力度(只加10分,维族“民考民”的大学录取分数线比汉族要低约100多分)有直接关系。^[6]

从受教育水平的低端来看,如果把“未上过学”和参加“扫盲班”的比例合在一起作为“文盲半文盲组”,回族中的这一比例在全疆各族中最高(13.05%),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分别为11.67%和10.49%。这三个民族的比例都显著高于汉族(6.76%)、蒙古族(4.9%)和哈萨克族(3.9%)。如果这两组再加上“小学毕业生”,那么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及只上过小学人口的比例在新疆各族的排序为:维吾尔族(64.86%)、回族(55.65)、柯尔克孜族

^① 1990年普查统计口径与2000年不同,“文盲与半文盲”的调查对象是15岁以上人口,无法进行比较。

(53.09%)、哈萨克族(52.43%)、蒙古族(41.46%)、汉族(34.55%)。

从受教育水平的高端和低端两个方面来分析,新疆各族人口在受教育程度的结构方面存在显著差距。一般来说,在学校受教育时间越长,学习和掌握的专业知识(数理化等专业课程)就更多,适应现代城镇就业市场要求的能力也就越强。除此之外,由于许多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学生缺乏汉语环境,传统上就读于民族学校,数理化等专业课程长期使用民文教材和民族语言授课,许多学生到了初中和高中后才具有初步的汉语对话能力,因此汉语能力成为少数民族小学毕业生和部分初中毕业生在城镇就业的一个主要障碍。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大学生在大学专业学习期间主要使用民文教材、民语授课,这使他们在大学掌握的专业知识很难与就业单位同事和业务工作对象进行交流,从而与专业技术的社会应用环境出现一定程度的脱节,明显降低了少数民族“民考民”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能力和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二、汉语能力已成为少数民族学生提高就业竞争力的一个“瓶颈”

中国社会在20世纪走过了从一个传统专制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艰苦历程,这一转型过程既包括了国家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迁,在经济上从基本上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变,也包括了从传统私塾、经文教育向从西方国家引进的现代学校教育体系的转型。特别是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和与国际经济、科技学术界的积极接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今天的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知识传播体系、一个全国性的劳动力流动和就业市场。根据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历,根据各地人才和劳动力市场对不同层次人员(高级管理人员、工程师、教师、技术工人、普通操作工人、服务业劳动者等)的需求,处于各层次的各族劳动者可以在全国任何地方求职、就业和发展。

(一) 中国的就业机会分配已从计划保障转为市场竞争

任何国家的就业市场都存在“通用语言文字”的工具性要求。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汉语文是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回族、满族的母语,壮族和南方许多少数民族把汉语作为学校的教学语言,汉语文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和“族际共同语”,因此汉语能力也就成为全国劳动力市场上实现就业和发展所需要的主要语言工具。所以,就业市场要求劳动者所具备的竞争能力,除了学历证明和毕业文凭外,还必须考虑劳动者的通用语言能力和掌握专业知识的语言载体,因为这是就业者在工作中进行交流和开展业务的基本条件。

在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如新疆、藏区和内蒙古),1950年代以来建成和发展了两套平行的语言教学体系——民语学校与普

通汉语学校。长期以来,各地的民语学校使用民族语言教学,有助于当地民族语言和传统文化的传承,这是必须肯定的工作成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岗位由政府以行政命令的就业计划统一安排,所以民语体系学习的少数民族毕业生不存在就业竞争的问题,各机关单位和工厂不存在工作业绩和经济效益的考核和相互比较,更不存在国际竞争。随着近三十年中国经济体制上的转型与发展,原来由计划经济体制保障的就业安置已经被激烈的市场竞争所替代,使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文能力和使用民族语文教材学习掌握的数理化等专业知识与全国性就业市场上普遍要求用汉语文表达的专业知识之间形成了一个语言隔膜。各族劳动者在掌握工具性语言方面的差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一度被隐藏在行政命令的就业保障中,而在今天的就业体制下,则公开展现在市场竞争中并由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加以衡量和调节。

(二) 语言应用的市场选择机制

在社会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中,特别是今天正规学校教育(如九年义务教育)已经基本普及后,有两个非常实际、可操作的指标有助于分析和衡量某种语言(学校教学语言)的工具性水平。这里先讨论第一个指标,在雇佣劳动力时就业市场对求职者应具有具体语言能力的要求。

1. 一般性的工作语言交流能力。不同产业的劳动者需要能够掌握与雇主(经理层)、同事(同组雇员)、业务对象(服务业顾客、贸易伙伴、上级机构)甚至必要时能够与政府—社会管理机构(监理、税务、司法等)进行一般性口头交流的语言能力。如果雇员缺乏这样的交流能力,一个公司、一个工厂、一个商店、一个旅店或餐馆就无法正常运作或营业。即使在几乎没有科技水平含量的传统服务业(餐饮业、修理业、零售业等)和科技水平含量低的传统手工业,也需要雇员能够进行简单口头对话来满足工作交流的需要。来自南疆农村的流动劳动力如果不能掌握基本的汉语交流能力,必然制约他们在乌鲁木齐和其他城市就业市场上的就业机会。

2. 使用行业内通用语言文字交流、学习工作所需要的专业性知识的能力。在社会分工发达、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知识体系不断创新和复杂化的现代社会,劳动力市场中属于专业技术人员或技术工人的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需要经过长期的专业学习后才能顺利进入就业市场。在专业技术劳动市场就业的人员不仅需要具有一般性的口头交流能力,还要掌握本专业通用语言学习和掌握的专业知识,以便能够与雇主(经理层、业务主管)、同事(合作研究者)、业务对象(研究成果购买者、政府与社会咨询机构)进行专业性业务交流。在中国,如果工作的主要合作者和业务对象限于国内,专业通用语言就是汉语文;如果工作的主要合作者和业务对象涉及境外,跨国专业通用语言主要是英语。

以这个指标来衡量,新疆维吾尔族劳动者如果没有使用汉语进行简单对话

的能力,一般只能够在家乡农村务农或者在城镇维吾尔族聚居社区的服务业就业;如果能够进行简单的汉语对话,就可以在城镇中其他街区的餐饮服务业、操作简单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如果熟练掌握汉语而且使用汉语文掌握数理化专业知识,就可以在对专业知识要求相对较多的企业、公司、政府机构里就业。对于使用民族文字教材学习数理化等专业知识的中学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由于他们学习专业知识的载体语言(民族语文)与市场上需求的载体语言(汉语)不匹配,即使顺利拿到毕业文凭,在人才和劳动力市场上仍会受到许多限制。因此,当社会中存在两种平行的教学语言体系的学校时,在统计人口教育水平和教育结构时就不能只关注“文化水平”(即毕业于哪一级学校),还必须统计以学校语言分类的学生数(如“民考民”、“民考汉”和“汉考汉”)。如果忽视了这一“语言分类”的教育统计,就不能够算是完整的、可以作为就业分析基础信息的教育统计数据。遗憾的是,我国的教育统计年鉴和全国统计年鉴始终缺乏这些统计数据。

考虑到顾客和业务同行的语言应用情况,现在我国城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都对劳动力有一定的语言能力要求,熟悉汉语已经成为基本的条件。根据从事具体工作的环境和性质,企业高级技工和业务主管人员除了必须用汉语掌握专业知识外,有时还需要掌握一门外语。政府可以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的学校招生方面的民族优惠政策,但是在今天的劳动力市场上,政府推行民族优惠政策的客观效果十分有限。在独立经营和强调效益核算的股份公司和私营企业,如果招收的少数民族毕业生或劳动者的工作业绩明显低于汉族,为了企业生存和公司效益,企业主管部门必然要限制招收少数民族员工;假如政府强行制定招收比例,影响公司的经营和效益,企业就会撤离新疆,这无疑不利于新疆的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笔者在基层调查时发现,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即使是十分同情维族毕业生的维族公司老板也不愿雇用维语学校的毕业生。^[7]根据大量的社会就业调查和各族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的统计数字来看,汉语交流能力弱与使用汉语掌握和表达专业知识的能力偏低,已经成为新疆民语体系各级学校毕业生实现就业的一个“瓶颈”。相比之下,“民考汉”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明显好于“民考民”毕业生,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语言能力的重要性。

三、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可以为少数民族学生 提供怎样的知识资源?

中国各族青年和大学毕业生都有自己的理想,都有积极参与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强烈愿望,期待在个人就业和发展中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理想,在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因自己的业绩得到回报(职位升迁、较高收入和社会地位)。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年轻人在勤奋努力之外,还需要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在社会分工高度发达和专业化的今天,这些知识和能

力只能通过专业学习和实践不断提高与丰富,而知识的学习积累必须以一种工具性语言文字为载体。这就是语言二重性中的工具属性。

(一) 各种语言文字工具性功能的相互比较

衡量语言工具性功能水平并可以对不同的语言工具进行相互比较的第二个指标是一种文字的出版物所能够提供的各领域、各层面特别是承载人类社会知识体系最新成果的知识信息量。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创新速度不断加快,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出版速度也同步加快,这从运输工具(飞机、地铁、高速铁路等)、通讯工具(光缆通讯、互联网、手机、智能手机、无线通讯等)、生物技术(器官移植、基因技术、干细胞再生技术等)的技术更新速度加快中可以充分显示出来。中国要想不落后于国际社会的发展,就必须不断加快我国年轻劳动力的知识学习速度、加快学习世界最前沿科技成果的速度,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不落伍并争取走在科技创新的前列。正是这样的全球性科技竞争对中国各族青少年提出了严峻挑战。

应当说近些年来,中央政府对我国的科技创新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非常重视,大家熟知的高校“211”工程和“985”项目、科技方面的“973”计划和形形色色的“人才工程”都是希望推动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科技创新逐步进入世界前列,使中国在新世纪仍然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出版业作为知识信息的汇集和传播载体,近年来发展速度非常快,为青少年接触和学习各类知识提供了条件。

(二) 中国的汉文和民族语文出版物的比较

需要关注的是,中国的出版物中约97%是汉文出版物。2010年全国总计出版图书328,397种^[8],其中少数民族文字图书9,429种,少数民族文字图书为出版图书总数的2.87%。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都是在国家经费补贴政策下得以出版的,其中相当部分是政府文件和政策宣传读物,很难见到介绍现代科技、社会科学普及读物和最新科研成果的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这在各民族出版社、各民族地区出版社的出版目录分类中一目了然。

通过这些统计数字可以清楚看到,汉语出版物在今天是中国各族共同拥有的不可替代的最庞大、最重要的知识与信息来源。通过一百多年的对外开放和社会发展,现代汉语词汇中已经吸收包容了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所有词汇,这一优势是中国其他任何民族语言文字无法相比的。英文出版物固然已经发展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前沿知识的出版载体,英文最新科技和人文社会科学出版物大致在三五年内就被及时译成汉文版出版,有的畅销书(如《哈利·波特》)甚至在半年内就有了汉文版。汉文出版物对最新科技、文化、科研知识信息的涵盖面和翻译速度,在世界上已没有其他语言可以相比。这样的翻译速度和涵盖面的广度,不仅其他发展中国家望尘莫及,连法国和德国学者

都非常羡慕和惊叹^①。中国的翻译界和出版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其背后的基础是以13亿人口为基数的庞大读者群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优势。我们有大量优秀的语言和专业兼通人才来从事最前沿科技成果的选择和翻译,上亿或几千万读者群的购买力使得这样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在经费上不但能够维持,而且还能赢利。

相比之下,各少数民族文字的出版和翻译工作就没有这么幸运,如果把英文、汉文各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前沿成果译成藏文、维吾尔文、蒙古文等文本出版,不仅缺乏专业 and 语言兼通的合格译者与校者,印刷出版后有限的销售量也使这样的翻译出版在经费上无法持续。现实世界中语言使用的基本格局使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工作受到很大的局限,也使少数民族学生和知识分子从民族文字出版物中获得知识信息的空间非常有限。

从表4、表5和表6中可以看到,在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和西藏大学这三个自治区重点大学的藏书种类中,维文图书在大多数学科中不到汉文图书的5%^②;在22项学科统计中,有18个学科蒙文图书甚至不到汉文图书的1%;如果不计算藏文古籍2400函,藏文图书种类总数不到汉文图书种类的0.02%,在哲学外的大多数学科中甚至不到汉文图书种类的0.1%^③。如果维吾尔族、蒙古族和藏族大学生不能流畅地阅读和理解汉文图书而主要靠阅读本族文字出版物来学习,他们在校学习期间所能够获得的专业知识和综合性知识必然受到极大的限制。

(三) 不同文字出版物所提供的知识体系的内容

如果再深入调查一下我国现存的维吾尔文、藏文、蒙古文书籍和各类出版物,把它们分为1910年以前的知识体系及出版物、1910~1950年间的出版物、1950年至今的出版物三大组,可能会发现各组比例结构的特点。如以藏文出版物和文献为例,很可能1910年以前的出版物占据总量中相当大的比重,仅仅各寺院珍藏的不同版本的《大藏经》就是一个巨大的数量。我们可以从这三组出版物各自所占比重出发,提出一个问题:从现有的民族文字出版物和历史文献中,少数民族青少年主要能够获取哪些知识?其中有多大比重是记载和传承本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知识的古代文献?有多大比重为传播现代化、现代科技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现代出版物?

在民语学校开设的民族语文课程,可以使少数民族熟练阅读本族文字的出版物,有助于学生阅读用本民族文字记载并流传下来的历史、文学、科技文献,

^① 在二战之后,英语奠定了其作为国际主要工具性语言的地位,随后法文和德文出版物的规模和重要性开始显著下降,以致在一些专业性强、读者群少的学科领域,有些法国和德国学者开始用英文出版自己的著作。

^② 2010年底新疆大学图书馆纸本图书总藏量为30万余种,其中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文献1.5万余种,占5%。

^③ 西藏大学图书馆的汉文藏书有85万余册,藏文藏书2万册(约占总藏书数量的2.3%)。

表 4 新疆大学汉文、维文藏书种类比较

图书分类 (部分)	北京大学图书馆		新疆大学图书馆	
	汉文图书	汉文图书	维文图书	维/汉文比例(%)
D0 政治理论	8988	1831	29	1.58
F8 财政金融	23541	4023	34	0.85
F3 农业经济	7318	1027	27	2.63
D9 法律	52153	14010	475	3.39
C91 社会学	11613	2338	100	4.28
K0 史学理论	3032	536	8	1.49
P1 天文学	1649	375	41	10.93
K9 地理学	12018	2516	98	3.90
Q1 普通生物学	1195	392	12	3.06
R3 基础医学	1899	364	60	16.48
R4 临床医学	521	155	62	40.00
O1 数学	10501	5753	110	1.91
O4 物理学	7454	3008	51	1.70
O6 化学	5735	4788	59	1.23
S4 植物保护	416	122	20	16.39

表 5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汉文、蒙文藏书种类比较

类名	类号	汉文图书	蒙文图书	蒙/汉文比例(%)
1 马列类	A	2195	17	0.77
2 哲学类	B	16460	87	0.53
3 社科总论	C	8385	22	0.26
4 政治法律	D	32313	145	0.45
5 军事类	E	841	8	0.95
6 经济	F	35543	67	0.19
7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G	12321	145	1.18
8 语言文字	H	14806	113	0.76
9 文学	I	37318	650	1.74
10 艺术	J	3290	131	3.98
11 历史、地理	K	26005	304	1.17
12 自然科学总论	N	1384	3	0.22
13 数理科学和化学	O	18071	14	0.08
14 天文学、地球科学	P	1427	21	1.47
15 生物科学	Q	5380	22	0.41
16 医药、卫生	R	1956	90	4.60
17 农业科学	S	2306	132	5.72

(续表)

类名	类号	汉文图书	蒙文图书	蒙/汉文比例(%)
18 工业技术	T	35464	28	0.08
19 交通运输	U	5309	1	0.02
20 航天、航空	V	72	1	1.39
21 环境科学、安全科学	X	2458	7	0.28
22 综合性图书	Z	3446	13	0.38
23 分类合计		266657	—	—
24 未分配索书号		2992	—	—
25 馆藏合计		437727	—	—

表6 西藏大学图书馆汉文、藏文藏书种类比较

分类号	分类名称	汉文图书	藏文图书	藏文/汉文(%)
A	马列主义	647	10	0.015
B	哲学	6927	788	0.114
C	社科总论	3985	43	0.011
D	政治法律	10554	84	0.008
E	军事	978	5	0.005
F	经济	18634	10	0.001
G	文科教体	8768	32	0.004
H	语言	9065	315	0.035
I	文学	21428	558	0.026
J	艺术	7235	70	0.010
K	历史地理	11989	376	0.031
N	自科总论	717	3	0.004
O	数理化	5132	14	0.003
P	天文地球	841	51	0.061
Q	生物科学	1349	6	0.004
R	医药卫生	8692	120	0.014
S	农业科学	2598	9	0.003
T	工业技术	19059	21	0.001
U	交通运输	1339	0	0.000
V	航空航天	111	0	0.000
X	环境劳保	868	2	0.002
Z	综合图书	1749	86	0.049
L	工具书	611	0	0.000
	其他分类	103	0	0.000
	合计	143379	2603	0.018
	藏文古籍	—	2400(函)	—

继承并发掘文化遗产,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继承和研究工作,我国各民族都有一些熟悉本族文献和文化典籍的老学者、老专家,这些文史专业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堪称世界领先。一些自治区的综合性大学如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西藏大学等,为这些民文文献的学习和研究开设了研究生专业课和研究岗位。这是中华文化继承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之相比,在民语学校使用民族语文开设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现代专业知识的课程中,学生能够阅读的民文课程教材和课外读物仅限于本族学者翻译的数量很少的民文出版物。除了本族教师同学这个圈子外,这些知识的语言文字载体限制了这些“民考民”学生在校学习和毕业后与其他人的交流和知识的实际运用。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民文专业教材的工具性功能只是帮助“民考民”学生完成课程考核和获得毕业文凭,除此之外这些民语的专业术语和公式等课程内容几乎没有其他实际运用场所。由于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学校教育起步较晚,数理化等应用性专业知识的队伍规模小,高层次学者和翻译人员更少,这在客观上决定了民文现代专业知识教材和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少数民族学生如果希望真正地把专业知识系统化,即使是在校学习期间也需要借助汉文专业教材和课外阅读材料^[9];如果他们希望继续在国内接受研究生教育和从事专业研究工作,就必须把专业工具语言转为汉语文;如果希望出国学习,则需要把专业工具语言转为留学国家的语言文字;他们在留学后如果决定回国工作,在国内的主要工具语言仍然需要转为汉语。不同于古人留下的历史文献,现代专业知识体系必须在专业交流和应用实践中不断更新与发展,这是一个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的动态的知识体系,而且知识的交流和应用又必须在一个客观现实的语言文字环境中使用某种工具性语言来开展。这个语言环境完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一个外在的、人们只能面对和接受的现实客观条件。语言文字的工具性在此体现得最为充分。

毫无疑问,中华各民族的文化历史遗产都必须得到珍视,必须学习和传承,但是如果我们在向后看的同时,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条件向前看,在当今科技迅速发展、激烈竞争的国际态势下,我国未来的发展前景会是什么样子?不应忘记,鸦片战争年代的中国并不缺乏历史悠久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清朝官员和士大夫在“向后看”的时候,看到了《四库全书》、《二十四史》,信心满满,无比自豪,于是他们不屑于向前看,不肯学习现代知识,结果是被“蛮夷”打得一败涂地。看到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东邻日本朝野震动,赶快“向前看”,全力学习现代知识体系,“脱亚入欧”,只用了三十年就迅速从“蛮夷”转变成颇具竞争实力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不欣赏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但是甲午战争深刻地教训了中国知识分子,“落后就要挨打”,假如一味沉溺于历史的辉煌而不肯向前看,不善于学习现代知识,最后难免“亡国灭种”。

当我们看到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和西藏大学图书馆中民族文字与汉文藏书的明显对比后,当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明显低于汉族学生时,可以尝

试提出另一个问题:回顾建国六十年和改革三十年的教育发展历程,在现代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少数民族和汉族青年(以大学毕业生为参照系)在真实竞争能力方面(排除政策倾斜因素)的差距在不断拉大还是逐步缩小?随着近年在所有知识领域中汉文出版物(包括12亿汉族人口中庞大知识分子群体的成果出版和翻译他国研究成果的汉文译本)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民族文字出版物所能提供的现代知识和汉文出版物之间的差距在今后很可能以更快的速度拉大,如果我们目前的学校教学语言体系保持不变,那么中国各族之间的“族群分层”差距是否还将进一步扩大?这很可能是我们今后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峻现实。

四、推动双语教育和加强汉语教学成为提高少数民族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少数民族与汉族学生之间在学校掌握知识信息资源和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的实际竞争能力存在明显差距,面对这一现实,我们能够提出什么办法来缩小乃至消除这一差距?政府和主流社会能够采用什么政府和措施来改善族群分层中的这一局面?

(一) 以少数民族毕业生为对象的政策性就业安置

一种思路是争取加大政府政策在就业方面对少数民族毕业生的优惠力度,比如制定各政府机构每年招收少数民族毕业生的规模,限定私营企业招收雇员中的少数民族比例等政策。这是一个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依靠政府行政命令安置就业的思路,相当于拣回计划经济时代“政策优惠”的拐棍,以此来支撑少数民族毕业生的就业需求。为了争取“优惠政策”,必然要以少数民族的“特殊性”作为论证的政治基础,凸显某个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权利差异。在重大政治变革(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替代中华民国、美国“民权运动”)后的一个时期内实行民族/族群优惠政策,能够得到多数群体的理解和支持,但是如果几十年持续长期实施民族优惠政策,必然会引发多数群体中年轻一代的反弹,他们看到自己作为国家公民、作为多数群体成员受到了“反向歧视”。同时,以群体为对象的优惠政策的实施必然使民族边界清晰化和加深族际隔阂,这对于民族团结与平等交流将产生负面影响。

同时,这样的民族优惠政策在中国缺乏长期实行的现实可操作性。现在我国政府部门的雇员规模已经很大,自朱镕基担任总理时就开始探索如何精简政府机构与人员,把计划经济时期的许多政府职能转交由社会和企业来运作,今后大规模扩大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雇员队伍的可能性十分有限。以新疆

为例,每年毕业的少数民族大学本科生和专科生约6万人^①,学习经历中形成的语言能力把他们绝大多数人的就业空间限制在新疆境内;而新疆各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不可能年年扩编,把这些毕业生全部吸收就业。推算出来的毕业生递增数字,充分说明这个思路脱离社会实际,也没有可持续性。

而且,如果这些毕业生的语言交流能力和实际业务能力缺乏竞争力,他们的就业岗位属于“政策性安置”,在岗位上并不能真正胜任工作,那么即使被招收进入单位,也会在日常工作业绩的检验和竞争中面临淘汰的风险。如果各单位把少数民族职工作为单独一类雇员进行独立评估考核,以避免在与汉族职工的比较中被淘汰,那就等于在部分职工中恢复了改革开放前的“铁饭碗”,这与改革的大方向是相违背的,汉族职工和民众对此必然出现反弹,民族隔阂的加强和潜在的族际冲突也在预料之中。

从长远看,这样的政策性就业安置无助于少数民族职工真正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竞争力。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如果高考成绩300多分,可以考上大学,一个高中学生何必要苦苦用功去争取考500分?^②如果没有达到平等竞争的录取标准,但是靠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政策“优惠”同样可以顺利就业,大学生在校期间何必拼命苦读?我们的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从感情上非常关爱和呵护本民族学生,但是这些少数民族学生迟早要进入激烈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必须“经风雨见世面”。对他们“爱之深”,就应当“责之切”。一些优惠政策的受惠者在心理上也难免出现某种扭曲,以民族身份特殊性的“自傲”来平衡自己实际竞争能力的“自卑”。从理性和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可能再为某个民族建立一个独立封闭的就业市场,少数民族青年必须在中国这个宏大的经济体和就业市场中开拓自己的未来。我们看到少数民族青年进入这个经济体和就业市场所面临的语言障碍,同时也要看到这个宏大的经济体和就业市场也为他们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学习的便利和巨大的空间。那么,我们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究竟怎样才能使少数民族学生真正提高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竞争能力,使他们对自已的业务能力具有充分的自信,使他们培养出凭实力在职场上拼搏自强的志气和健康心态?

当然,作为一些临时性措施,我们不排除政府运用政策和行政手段来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就业的一些具体做法。例如现在“对口支援”新疆的省市接受了2万名新疆待业大学生在沿海省市学习培训两年,以提高他们的汉语能力和业务技能,帮助他们实现就业,这无疑有助于这些毕业生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

^① 201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学本科毕业生28,902人,大专毕业生34,641人,共计63,543人;西藏自治区大学本科毕业生4,645人,大专毕业生3,621人,共计8,266人。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756页。

^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1年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为:理科(本科第一批)民语言考生353分(数学最低分34分),汉语言考生473分;文科(本科第一批)民语言考生424分(数学最低分30分),汉语言考生504分。(2011年06月28日12:06 腾讯高考[微博]讯)

但这是“治标”而非“治本”的办法,我们不可能期望这类项目成为长远的惯例,而且这种“就业再培训”项目只能再次证明新疆在高等教育方面的缺陷和差距。

(二) 努力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能力和专业竞争力

第二种思路是探索如何真正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能力、知识技术和就业竞争能力。这就需要系统分析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对症下药,寻找能够“治本”而不是仅仅“治标”的办法。这就是在这些学生在校期间,有效地提高他们的汉语交流和学习能力,让他们主要使用汉语来学习数理化等就业需要的专业知识,努力使少数民族学生在毕业时基本达到汉族学生大致相同的就业竞争能力。现在沿海省市对新疆2万待业大学毕业生所做的培训也正是为达到同样目的而做的“补救”工作。

近些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提倡“双语教学”、努力培养“民汉兼通”人才,就属于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就业竞争力的第二种思路,并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在新疆中小学的双语教育“模式一”,推行理科课程(数理化、生物、信息技术)等用汉语授课、人文课程(历史、地理、品德与生活、地方课程)等用母语授课,这将显著提高学生的汉语交流能力以及使用汉语文掌握应用性(数理化等)专业知识的能力,从而逐步使少数民族学生达到与汉族学生相同的语言能力、知识水平和就业竞争能力。

由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如南疆)缺乏汉语环境,也缺乏足够的双语教师,所以在“双语教学班”就读学生的规模不大。2008年在“双语教学班”就读的学生仅占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总数的6.6%。由于非常缺乏真正合格的双语教师,这在客观条件上限制了“双语班”就读学生的规模和教学质量。建国六十年形成的学校教学模式和传统绝非在短时期内能够调整过来;但是毫无疑问,推动双语教育是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就业竞争力、提高少数民族整体投身中国现代化事业能力的努力方向。

(三) 推行“双语教育”中需要妥善处理的问题

在推行双语教学的过程中,有一系列相关问题需要妥善处理。

第一,“双语教育”不是“汉语教育”。我们的目标是培养“民汉兼通”的少数民族和当地汉族人才,绝不是取消民族语言,所以在加强汉语教学的同时也要关注民语课程的课时保证和教学质量,二者不可偏废。究竟应该在哪一年级开始哪种语言的教学?如何安排两种语言的课时比例最为适宜?两种语言在教学中交叉使用的最佳模式是什么?这些在双语教育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只能在实践中摸索着予以回答。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科学态度,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语言环境和师资条件制定出多种教学模式(民语教学加授汉语课、汉语教学加授民语课,两组课程分别用民语和汉语授课等),以满足各地民众的受教育需求。

第二,我们必须切实维持宪法中保护的少数民族选择学习语言的权利^[10]。在各个城镇和乡村,教育部门可根据当地语言环境和民族需求向民众提供多种教学模式(民语教学加授汉语课、汉语教学加授民语课、双语教育)的学校,由家长和学生不同的教学模式中进行自愿选择,使他们有“选择的权利”,决不能通过行政命令强制推行一种教学模式。尽管双语教育是当前和今后经济发展和就业市场所要求的发展方向,但是学校教学模式的调整是一个需要长期逐步推动的发展过程。

第三,需要改变“少数民族学汉语,汉族不学少数民族语言”的单向语言学习模式。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如西藏、南疆地区)的传统汉校,应及早开设当地民族语文课程。这不但可以促进族际沟通,使广大汉族学生了解和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加强各民族之间平等的文化交流,可以培养一大批“民汉兼通”的汉族学生,同时也可以安排一部分少数民族教师的工作岗位,继续发挥他们的语言特长,使他们为民族文化交流作出新的贡献。

第四,必须把培养合格双语教师作为双语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11]。能够说两种语言并不一定是合格的双语教师,要制定客观和可操作的“双语教师”考核办法。目前的双语教师队伍几乎完全是少数民族教师,今后应大力鼓励汉族学习民族语言并积极培养汉族双语教师,这将有效地提高双语教育的质量并促进民族交流。

第五,目前在基层学校中有相当比例的教师达不到双语教师的标准,却占用各学校的教师编制。如果不建立严格和定期的考核标准和淘汰机制,一些可担任双语教师的合格人员(区内大学的“民考汉”毕业生、由“内高班”培养并在内地大学毕业的学生)就无法得到录用,目前新疆双语教师队伍的质量问题也无法解决。

第六,在从传统民语教学模式向双语教学模式过渡的阶段中,必然有一部分教师由于年龄、语言基础等原因不能适应双语教学工作的要求,需要安排转岗。政府需要妥善安置各学校不适应双语教学的少数民族教师的工作和福利,充分肯定他们的工作成绩,尊重他们过去在教学岗位上做出的成绩,爱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各地政府部门需要在定期考核的基础上对这些转岗人员的再就业做出具体规划。西藏、新疆旅游事业的迅速发展需要有一定教育基础、熟悉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大量从业人员,他们的加入可以明显提高西部旅游业的文化素质,类似的产业发展契机为安置学校转岗教师提供了机会。

第七,根据我们的实地调查发现,在教学第一线任教的双语教师在备课、课外辅导等方面比其他教师的工作量要超过很多。如果政府教育部门不能大幅度提高中小学教师、特别是双语教师的工资待遇^①,就无法吸引优秀人才从事双

^① 据我们2011年7月在南疆调查时了解,当地学前班教师每月收入约600~800元,小学教师每月1200元,中学教师每月1500元。

语教学,也无法阻止现有优秀教师的不断流失。特别是在偏远地区和基层学校任教的教师,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比城镇学校要艰苦得多,建议教育部和自治区共同设立边疆学校、基层学校的教师特殊津贴,以鼓励在这些岗位辛勤教学的教师们。

第八,民语学校和在校学生规模在新疆和西藏占有很大比重,各地区的语言条件和教师队伍基础不一样,教学模式的转型对教学效果的影响也不一样。因此,教育部门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在课堂教学方法、教材选编、教师培训、学生辅导等各方面组织双语教学、提高教学经验的经验。在全面铺开之前,选择有代表性的若干所中小学校进行“试点”,在实践中总结经验,逐步推广,这是我党长期以来开展各项工作的一个成功做法,在双语教育方面也应当坚持这个思路。教育是一门实践的 science,教育的对象是我们的孩子和国家的接班人,在取得经验之前,切忌贸然铺开,“大干快上”。如果把双语教育作为政绩工程,“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将会带来“大跃进”那样的灾难性后果,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承担的历史责任。

第九,需要不断补充和提高少数民族语文的相应教材和课外阅读材料的数量和质量,这不仅是顺利开展双语教学的必要条件,也是提高民族语文教育和努力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必要条件。目前各地少数民族语文教材大多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印的全国统编教材的翻译,其中一些内容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生活距离很远,非常需要增加与当地民族的历史、文化、地理、生活习俗相关的内容,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可以在教学中传承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遗产。

第十,我国少数民族语文出版工作应当继续加强,不断增加民文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不仅在普及读物方面,也应加强现代科技知识的翻译介绍,做好普及和提高两方面的工作。中央政府应当继续加大相关经费投入,增强翻译和编辑专业队伍,使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工作繁荣起来,为民族语文教学和发展民族语言文字提供必要的实体支撑。

中国社会正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换代,争取尽快从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作为竞争力、生产一般科技水准产品的“世界加工厂”转变成有创新实力、独立品牌、最新科技、高附加值的世界科技工业大国。为此,必须在质和量这两个维度上加快发展全国的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培养基础扎实、全面发展、既有创新意识又有创新能力的一代中国人。作为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与人才培养必须全面纳入这一教育体系的整体发展规划之中。

五、结语

中国有56个民族,由于历史原因,各民族的发展水平不平衡,每个少数民

族既有保存和延续本族传统文化和语言的深厚感情,又有使本族成员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并得到充分发展的强烈愿望。从根本上来讲,只有每个兄弟民族都得到充分的发展,彻底消除目前在“受教育水平”和“族群分层”结构方面存在的差距,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整体的充分发展。中国各少数民族的优秀人才不仅应当在本族自治地方担任党政干部,也应当被选送到沿海和中部地区各省市任职,应当使我国各少数民族当中涌现出国内和国际一流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天文学家,涌现出杰出的经济专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法律专家、医生和将军,要在少数民族当中培养出有魄力、有眼光、有能力的新一代政治领导人,使市场开拓、产业升级和对外开放过程中涌现出更多的少数民族企业家,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中能够看到各少数民族的身影。唯有出现这样的局面,各民族在自信心、话语权和决策参与权等方面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才有可能在经济建设事业中实现共同繁荣。这一人才培养工作只能落实在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上,因此,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如何发展,直接关系到少数民族新一代在高级人才和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关系到各民族在未来中华民族大家庭政治结构、经济体系、文化生活中的相对地位。如果不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如二十至五十年内)使中国各少数民族在各行各业的发展中真正具有与汉族相似的实际竞争能力,那么从历史长远发展来看,必将影响到中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参考文献

- [1] 马戎. 试论语言社会学在社会变迁与族群关系研究中的应用[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2): 129-135.
- [2] 马戎. 民族社会学: 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32.
- [3][4] [美] 马丁·N. 麦格. 族群社会学: 美国及全球视角下的种族与族群关系(第六版)[M]. 祖力亚提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7: 206, 166.
- [5]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11)[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 352.
- [6] 李晓霞. 新疆高校招生中对少数民族考生优惠政策的分析[A]. 马戎, 郭志刚. 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181.
- [7] 马戎. 少数民族社会发展与就业[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402.
- [8]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11)[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 902.
- [9] 马戎. 新疆民族教育的发展与双语教育的实践[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8(2): 2-41.
- [10][11] 马戎. 西藏社会发展与双语教育[J]. 中国藏学, 2011(2): 114-145.

(责任编辑 李春萍)

employ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apparent gender discrimination. The argument that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for doctresses to get a job was overstated. There was no sufficient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argument that it is even harder for single doctresses to get a job since they might get married and have a baby soon after. However, the study found that a good marriage could promote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doctresses.

Has China Achieved Universal Primary Education in Poor Rural Areas? A Case from Yunnan Province

LIU Zeyun, HU Wenbin

Page 124

Using the data from six national poverty counties in 2006 and 2010 in Yunnan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imary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poor rural areas and the factors which have impacts on the enrolment and completion rates. The study shows that in 2010, universal primary schooling has basically achieved for the age cohort of 7-13 years old, but not for the age cohort of 6-11 years old. At same time, gender is no longer a factor impacting primary schooling anymore. However, those groups, such as the children of minority groups, with poor health situation and from the families with low income, are still facing difficulties in accessing and finishing primary school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school and home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in primary schooling access and completion.

Considering Bilingual Educ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a Modernization Perspective

MA Rong

Page 136

Whether ethnic minorities in a multi-ethnic country can fully participate in the national modernization process is a key issue in ethnic equality and national solidarity.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f ethnic stratification and citing census data of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labor force in China.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only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ethnic minorities have a similar occupational structure as the majority Han, the minorities will b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enjoy the corresponding social influences in national decision-making. After China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central planning economy into a market-oriented economy, the employment of minority laborers and university graduates has become largely depended on their capacity of Mandarin and learning knowledge in Mandarin.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Mandarin publications for minority students to learn the modern knowledge via comparisons of library collections in Mandarin and local minority languages among three universities in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points out that bilingual education can be viewed as a channel for minority students to access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participate in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t the end, this paper discusses several issues that should be carefully handled in bilingual education in China.

The Moder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and The Theory of Pedagogic Knowledge

GUO Hua

Page 157

The theory of pedagogic knowledge reveal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that the moder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focuses on the imparting of systematic knowledge. In general, moder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although it still has many defects. Researchers should improve the moder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under sound rationality instead of subverting it irrationally. Researchers should carry out diversified studies on the theory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seek for the unity of science and humanity, as well as the unity of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and enhance the role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Exploratory Reform Practice and High Leverage Practice: Comparisons between Two Ideas of Teacher Education Practice in China and US

YANG Lan

Page 165

Exploratory reform practice and high leverage practice are new ideas in teacher education developed respectively by Chinese and American researchers in last decade. They were proposed to deal with the complexities in teacher education and instruction innovation. They differ in their philosophi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boundary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the design of operational interventions. The two lines of practice are both valuable in future designs of teacher education.